

行

路

集

葛剑雄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王元化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路集 / 葛剑雄著.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第三代学人自选集 / 王元化主编)

ISBN 7-5328-2673-2

I. 行… II. 葛… III. 历史地理 - 研究 - 文集 IV. 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6608 号

第三代学人自选集

王元化 主编

行路集

葛剑雄 著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2023919 传真: 2011455

网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规格: 880mm×1230mm 32 开本

印张: 9.875 印张

插页: 5 插页

字数: 228 千字

书号: ISBN 7-5328-2673-2/G·2459

定价: 16.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行路者自白

永在路上(代自序) 003

五十述学 012

真实的历史:永恒的追求
——我的史学观 023

书生意气

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主人意识 041

纳税人的义务和权利:社会公正的基础 048

人地之间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创我国历史地理
研究的新阶段 059

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 的影响	076
关于环境保护的几点思考	088
正确认识国情	097
移民与中国的现代化	106

普天之下

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	113
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	125
民族主义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吗?	142
我们应有的反思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	146
开放观念与世界新文明	158
世纪杂感	167

亿兆斯民

略论我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177
论中国史上之户口 ——兼论准确使用梁方仲《中国历代 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193
秦汉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	210
永嘉之乱后的人口南迁	235
宋代人口新证	283
论中国的大古都的等级及其量化分析 ——兼答安阳能否列为“七大古都”	303

1

行路者自白

永在路上

(代自序)

山东教育出版社邀我编一本自选集，列入他们策划的“第三代学人自选集”。我很赞赏这个书名，也很乐意将自己的文字列入这套丛书。

丛书规定的作者是第三代学人，根据策划者的定义，“是指50年代（包括4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第三代学人”，“既指老三届也指新三届”。我出生于1945年，年龄上虽不属主流，却尚未超过上限；高中毕业于1964年，挤不进老三届；但考入研究生是“文革”后

首届，属于广义的“新三届”（即包括研究生在内）；总之，我虽算不上正宗，但还是“第三代学人”中的一员。

我与大多数第三代学人最大的差异，是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也不是“文革”开始后再告别学生时代，而是在1965年就当了一名中学教师，已是“国家干部”，所以在“文革”中有与他们不同的经历和体验。例如在“文革”初期，我既是积极揭批“牛鬼蛇神”的“左派”教师，又是“革命小将”的斗争对象，因为班主任也属“当权派”，自然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所以要“引火烧身”，号召学生贴我的大字报。到了上山下乡的高潮时，我又负有动员老三届之责，我担任班主任的一个68届班级中除了几位有幸参军的学生外，全部上山下乡。我带的一个73届班级的毕业生也大多下乡。到了大学重新招生时，眼看一批批包括老三届在内的“工农兵”学员进了大学，却没有听说教师也有这样的资格，尽管上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目标。20年前恢复高考时，我已过了报名的年龄，直到研究生招生时才意外地获得机会，与“第三代”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此后就同在路上。

1978年10月，我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师从谭其骧教授，攻读历史地理专业。在学期间，国家决定实行学位制度，所以当我们在1981年底毕业时，同时获得了硕士学位。我留系工作，并担任谭先生的助手。到次年3月，学校招收首批博士生，我被录取为谭先生的在职博士生。1983年夏，学校报请教育部批准我和周振鹤提前毕业，我们在8月通过论文答辩，10月获得博士学位，是全国文科的首批。在恢复职称评定的1985年，我被评为副教授，1991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起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发表于1980年，硕士论文《西汉人口考》发表于1981年第4期《中国史研究》。我的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于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国内也是第一篇。此后，我先后出版了《中国人口发展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简明中国移民史》（合著）等十余种著作，发表了百余篇论文，主持并完成了多项国家科研项目。最近，由我与吴松弟、曹树基合著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暂时告一段落。同时，我们正在撰写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预计在明年完成，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回想起来，我能走上这样一条路真是一种难得的机遇。

1964年我高中毕业时，因肺结核病尚未痊愈，不能参加高考，经过一年的师资培训，当了一名中学教师。我一直以进入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为奋斗目标，参加工作后也希望有朝一日还能进大学深造，但随着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和“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的来临，这一线希望也随之破灭。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联合、复课闹革命、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上山下乡、一打三反、三忠于四无限、备战备荒、拉练、批林批孔、评法反儒、批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等接连不断的运动中，能够不站错队、不成为运动的对象已属万幸，哪里还指望再上大学，甚至“成名成家”？

1977年高考恢复时我已过了31岁，超过了报名年龄的上限，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为他们辅导复习。一些学生经过努力考上了大学，我多少得到了一点安慰，但也不胜惆怅，这几个月的时间差使我永远丧失了进大学的机会。就在这时，传来了研究生恢复招生的消息，并且是“不拘一格”，我

不禁喜出望外。

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足以载入共和国的史册，在世界教育史上大概也是一项空前的纪录。它不仅为十几年来被剥夺了深造机会的大学生提供了机会，也为我们这样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以后我知道，像我这样的高中毕业生还不算是学历低的，复旦大学录取的研究生中就有连初中也没有毕业的。老实说，我当时对研究生的报考要求和培养目标并不十分了解，只是因为不受年龄和学历的限制，只是为了圆上大学的梦。

我那时在一所中学担任“教革组”（相当现在的教导处）负责人和团委书记，主管全校的学生工作，此前一年刚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被选为市人大代表，所以很担心领导是否会同意我离开学校，自己也感到于心不安。加上对考试结果毫无把握，报名和初试时我都不敢声张。记得考试那两天，我都是先在全校例行的早读课上讲完话，才骑车去考场。接到复试通知后，才按当时规定，请了两星期的假集中复习。但从区教育局到学校领导，无不为我一路绿灯。教育局一位老局长表示，只要我能录取，学校困难再大也要克服。就这样，一切都出乎意料地顺利，我戴上了复旦大学的黄色校徽。

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特有的经历，在这一届研究生中，不少人都有一段辛酸、曲折的故事。但不管如何辛酸曲折，我们终于成了研究生，比起大量永远丧失了这样的机会的人，我们是何等幸运！

我就读的高中是上海市一所重点中学，有几位同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考时却名落孙山，我当时感到十分意外，以后才知道他们的家庭出身都“有问题”。一位才华横溢的同学落榜后，我天真地以为只是偶然失常，劝他明年再试一次，他却

默然无言，不久就报名去了新疆，从此杳无音讯。一位数学成绩极好的同学在5月就得到班主任的“劝告”，提醒他注意父亲的问题，要他放弃升学的念头，他却存侥幸心理，坚持一试，结果自然一无所得，连他考高中的妹妹也惨遭淘汰。二十多年后，我收到他从新疆的来信，看到照片上饱经风霜的容貌，读着那令人心碎的字句，谁都能理解他对失去青春和理想的悲哀。

在我的教师生涯中，也教到过不少优秀的学生，有的天资过人，有的刻苦好学，有的温文尔雅，有的朴实诚恳，作为教师，我真希望他们在毕业后能获得继续学习的机会，至少有一个过得去的工作。但在“文革”中我却爱莫能助，只能完全不顾他们自身的条件，按照当时的“政策”——根据家庭出身和兄姐的“去向”，决定他们上山下乡的地点或工作岗位。一位有很强组织能力、文笔流畅的学生干部被分配下乡，父母为避免他去边疆，将他安排在家乡“投亲插队”。几年后再见到他时，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对我的询问只是木讷的苦笑。多少本来可以造就的人才就这样泯灭了。

有人认为1977年以后这几届本科生、研究生中出了很多人才，这固然是事实，但另一方面的事实是，这是十年或更长的时间积累起来的，如果以十年平均计算的话，人才的数量就很少了。还有人以此为理由，证明上山下乡或停办大学也取得了成绩。我很怀疑这些人中有没有“文化革命”的受益者，至少有些人对“文革”的祸害已经麻木不仁，因为要是没有“文化革命”，没有上山下乡或停办大学这样的破坏性运动，能成长的人才肯定会多好几倍。我们这一代人与祖国一起走过了这段艰难的路，但最后能走到大学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不用说再大的劫难，就是“文革”再晚结束几年，也就不会有我的今

天了。

入学以后，我更体会到我们这一批研究生的幸运了。开始听到邓小平关于让科研人员以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的讲话时，多少有些怀疑能不能做到，但实际上，我们用于专业学习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六分之五。我们研究所的教师告诉过我这样两个例子：谭先生“文革”前招收的一位研究生从入学开始时忙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项“政治任务”，根本没有学习专业的时间。有一年暑假，学校举办外语培训班，她要求每星期抽出一点时间参加，还是没有被批准。还有一位中年教师，多年来一直参加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每天晚上也安排工作，他提出能否让他有几个晚上在家看看《资治通鉴》等书，做点史料积累，也被领导断然拒绝，还受到批评。我们还发现，很多毕业于60年代的教师，在学期间真正上课的时间不到一半，工作后运动不断，就是搞业务、搞科研也得与“政治”的实际结合，更没有个人研究的自由。所以尽管他们在大学工作了一二十年，却没有打下什么专业基础。

我在协助谭先生整理他的论文集时，注意到他在解放前后有好几年都没有留下一篇论文。以后他告诉我：从1932年研究生毕业发表第一篇论文起，真正能搞学问的时间并不多。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1940年初他离开燕京大学奔向后方，在内迁于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战时生活艰辛，图书资料奇缺，根本无法作系统的研究。1946年复员回杭州，不久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他奔波于杭州、上海之间，同时在浙江大学和暨南大学任“专任教授”，才勉强维持生计。解放后浙江大学停办历史系，他们学习了一年马列主义。转到复旦大学后就下乡参加土改，接着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都需要停课脱产。1957年起更是运动不断，运动期间停课是常有

的事，就是不停课也未必还能写论文。文化革命的十年间，前两年完全不能搞业务，以后又只能结合“政治任务”或根据“政治”需要写论文，直到1977年后才逐渐恢复正常。所以他在年逾古稀后写成的论文竟比解放后的前30年还多，尽管那时他已半身不遂，还同时承担着繁重的科研任务。

只有祖国走上了康庄大道，我才能走上治学之路。从我们的老师到我们的同辈，大多数人都未曾有过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不仅是这一代人中的幸运者，也比老师和年长的一代人幸运，岂能不加倍地珍惜这样的机会？近20年来，我时时感到，从我们的老师到学生，三代人都在注视着我们。我时时感到，我不仅是为了追寻自己的目标而走在这条路上，也是为了弥补三代人的缺憾，为了同时代的那些不幸者。我时时感到的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使我形成越来越强烈的愿望，越来越高的目标，远远超出了我原来的梦想，却始终没有完全满足的感觉。

正因为如此，20年来我不敢稍有懈怠，一直在路上一步步地行走。改革开放给我们铺就了一条坦途，但要走稳走快、走到前列也并非易事。现在回首往事，我还不知道是否走得很好，只能说尽了心，尽了力。所以我愿意将这些年里发表的文字选出一部分，保留下一串脚印。

为了如实地显示这些脚印，除了个别错字以外，文章都不作修改，保持初次问世时的原貌。但有些文章在发表时限于篇幅，往往有所删节，现在补全了删节部分，以见全貌。

不少名作家都说过，重读自己以往的作品，就像看到自己的童年时代一样，会觉得过于稚嫩。整理旧作时，我也时常为自己当年的浅薄和粗糙而羞愧。但同时也会自我陶醉于某些旧作，甚至暗自惊叹当时竟写得如此好。这倒不是自满自足，也

不是想故步自封，而是说明一个人并不总是在进步的，更不可能在每一方面都越来越好。超越别人不易，超越自己或许更难。在年过 50 之后，我倒愿意经常能发现旧作的稚拙，而不希望老是欣赏它们的成熟。

不过无论如何，我不会停步，因为离目标尚远。我并非不知道目标总是无法完全实现的，因为目标在不断更新和提高，但我愿一直走下去，愿自己永在路上。

最后要说明一下本书的编排：

排在本文之后的是《五十述学》，这是应友人之约为一本集子写的，但目前尚未见出版。另一篇《我的史学观》，顾名思义就是谈我自己的观点的，文章虽写成于 1991 年，却因所编入的论文集一直没有问世而未能与读者见面。这三篇合在一起，等于做了一次自我介绍，所以将这组名之为“行路者自白”。

第二组“书生意气”是两篇对现实问题的议论，在我近年所发表的这类文章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尽管不在我的专业范围，却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特别是后一篇。

编入第三组的五篇文章发表于 1982 年至 1996 年之间，都是有关地理环境、人地关系、环境保护和国情方面的，所以称之为“人地之间”。其中第一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创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阶段》是由我执笔，经先师谭其骧先生和邹逸麟先生修改补充后，由我们三人署名发表的；第二篇则是我对有关问题进一步研究的成果；将它们放在一起可以看出我的探索过程。

第四组的六篇文章长短不一，或是学术论文，或为杂感小品，但无论是研究以往的统一和分裂，反思抗日战争，剖析“民族主义”，还是纵览世纪，放言世界新文明，都环绕着中国

和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主题，所以我借用了我一本小册子的书名——“普天之下”。

最后一组“亿兆斯民”，用的也是我用过的书名，因为这六篇论文中有五篇是有关历史人口研究方面的，这是我十几年来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所以占的篇幅也最大。只有另一篇是论述中国古都研究的方法，自以为有所创新，所以敝帚自珍，不愿舍弃，但又不便另立一组，就附在这里。

这些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82年，最近的一篇发表于今年，其中有三篇是首次发表。它们虽然没有全部覆盖我的研究领域和涉及的方面，但可以看作我在以往近二十年间留下的脚印，所以名之为《行路集》。

1997年7月1日于举国欢庆中

五十述学

我生于 1945 年底，今年已过了 50。如果 21 世纪的环境和科学能让我活到 100 岁的话，现在开始就是后半世了。要按 50 年代前的习惯，到这年纪早该称老了，但现在称我为老葛、小葛的都有，却从未听到称我为葛老的。要真听见，肯定也不会答应，以为是在叫一位与我同姓的老人。不过，毕竟已到了后半世，回顾一下自己前半世走过的治学道路，使以后能走得更稳一点，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到 1978 年 10 月研究生入学后才

接触专业，而真正从事历史地理的研究还更晚，1980年才发表第一篇文章，那时已35岁。而在今天，不少不满35岁的学者已是论著迭出，成为教授或学术带头人。正因为开始得晚，又缺少大学的正规训练，我深知只能以勤奋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在习惯了长期自学后，我对大学的一切条件都感到满足，总想尽量多学一些。渐渐地我也发现了自己的优势，知识结构杂，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分析判断能力较强，这正是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所需要的，我的选择可谓歪打正着。

第一学期时谭先生给我们讲《汉书·地理志》，提到志中户口数字的价值，我觉得很有意义。课程结束时，先生要我们每人选一个郡试做一份注释，为了完成作业，并能在户口数字方面有所发挥，我特意将整部《汉书》翻了一遍，找到了一些与户口有关的资料。看了以后，却对《地理志》中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是西汉户口最多年份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不久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看到他也有这样的看法，不过王氏并没有举出具体的证据。于是我将自己的理由写成一篇短文交给谭师，他认为我的说法可以成立，收入了《复旦学报》的一期历史地理专辑。

这使我对西汉的人口问题有了更大的兴趣，就想读一些前人的论著。但查找的结果却使我大失所望，因为从30年代劳干发表了两篇论文（《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两汉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册，1935年12月）以后，还没有什么超过他的研究成果问世。而某些已被视为定论的说法，如西汉初只有600万人口，虽然得到梁启超的肯定，却是毫无史料根据的臆断。这时我萌生了研究西汉人口的念头，并就已经发现的几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谭师看后就问我：“何不在此基础上写